

刘振岚 著

戊戌维新运动

专题研究



梁启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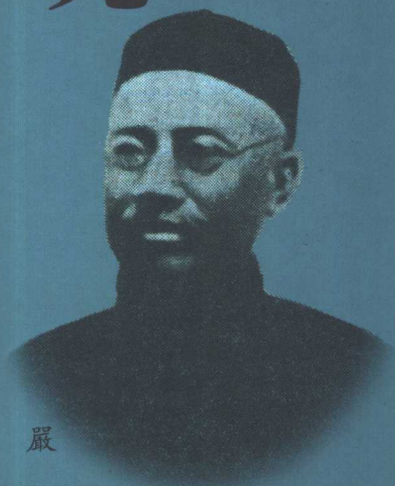
谭嗣同



康有为



光緒皇帝



嚴復



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

刘振岚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刘振岚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0

ISBN 7-81064-053-4

I. 戊… II. 刘… III. 戊戌变法-研究 IV. 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830 号

WUXUWEIXINYUNDONGZHUANTIYANJIUJIANGZUO

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66 千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第一讲 建国以来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状况简介	(1)
一、各阶段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	(3)
(一)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至 60 年代中期	(3)
(二) 第二阶段——十年动乱时期	(5)
(三) 第三阶段——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至 1988 年 11 月	(6)
(四) 第四阶段——1988 年 11 月至 1993 年 11 月	(9)
(五) 第五阶段——1993 年 11 月至 1997 年末	(10)
二、史学界对几个重要问题的不同观点	(12)
(一) 关于戊戌变法的性质	(12)
(二) 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8)
(三) 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关系	(29)
(四) 戊戌维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34)
第二讲 戊戌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思想述评	(42)
第一节 康有为与《戊戌奏稿》	(42)
一、上下求索和立意变法	(42)
家世·时代·环境	(42)
求学·探索·立变法之志	(50)
上清帝第一书	(60)

二、今文经学与“托古改制”	(67)
经今古文的起源和演变	(67)
康有为与经今古文问题	(71)
万木草堂讲学	(75)
《新学伪经考》	(78)
《孔子改制考》	(81)
“大同三世说”	(88)
三、上清帝书与变法纲领	(96)
建立君主立宪制——维新派的基本政治纲领	(97)
开制度局——变法的施政纲领	(102)
四、外国变政考与“仿洋改制”	(114)
“仿洋改制”的内容	(114)
“仿洋改制”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	(123)
五、《戊戌奏稿》及其改纂	(124)
《杰士上书汇录》等一批新史料的发现	(125)
《戊戌奏稿》改纂的内容	(127)
《戊戌奏稿》改纂的原因	(134)
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的重新考订	(135)
第二节 梁启超与《时务报》	(137)
一、康有为的得意门生	(137)
家世·神童·少年举子	(137)
万木草堂的高材生	(140)
二、创办《时务报》，维新变法的卓越宣传家	(143)
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唤“救亡以图存”	(145)
以进化论为武器，论证变法的必要性与合理	

性	(151)
批判洋务派, 强调变法“须知本原”	(162)
“伸民权”是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核心	(170)
第三节 谭嗣同与《仁学》	(190)
一、青少年时代与变革思想的萌芽	(191)
家庭生活铸成其叛逆性格的根苗	(191)
拜师读书与崇尚“任侠”	(193)
考察风土人情与了解社会	(195)
二、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196)
形成的原因	(196)
主要内容	(201)
三、《仁学》——时代的强音	(206)
“仁”的基本内容	(207)
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观	(210)
以“日新”为特色的进化论历史观	(215)
抨击封建君权和伦理纲常	(217)
四、为变法而献身	(224)
活跃于宁沪	(224)
推进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	(225)
参与百日维新	(240)
夜访袁世凯	(243)
慷慨就义	(249)
关于《狱中题壁诗》和《绝命书》的真伪考辨	(250)
第四节 严复与西学	(269)
一、系统地接受资本主义教育	(269)
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	(269)

留学英国	(270)
任教于天津水师学堂	(273)
二、维新变法思想	(275)
宣传进化论	(276)
鼓吹民主	(285)
批判旧学, 提倡科学	(294)
三、变法实践活动	(301)
助办通艺学堂	(301)
创办《国闻报》	(302)
受光绪帝召见	(303)
四、开辟了西学传播的新阶段	(305)
第三讲 戊戌变法	(311)
第一节 百日维新	(311)
一、诏定国是	(311)
维新派的敦促	(311)
光绪帝的决心	(313)
“定国是诏”	(314)
二、变法新政	(317)
文教改革	(318)
经济改革	(325)
政治改革	(331)
从制度局到懋勤殿	(334)
第二节 戊戌政变	(339)
一、维新与守旧势力的拼搏	(339)
己酉三旨	(339)
后党大臣许应骙被劾	(342)
后党御史文悌被斥退	(342)

礼部六堂官事件	(343)
二、戊戌政变史实考辨	(345)
顽固派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	(345)
政变经过	(357)
维新派的“戊戌密谋”	(362)
第四讲 戊戌维新运动历史经验总结	(368)
第一节 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368)
一、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	(369)
戊戌维新运动是 19 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	
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	(369)
“救亡图存”既是维新派变法的出发点和目的，	
又是他们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	(372)
二、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	(374)
“改良”与“革命”	(375)
“改良”与“改良主义”	(382)
三、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	(387)
“救亡”唤起启蒙	(388)
输入“西学”——启蒙的文化触媒	(389)
戊戌启蒙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391)
戊戌启蒙的局限性	(392)
第二节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393)
一、客观原因——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	
弱小	(395)
二、主观原因——维新派的局限性与策略错误 ...	(399)
“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缺乏说服力	(399)
维新派对于斗争的尖锐性认识不足	(402)

维新派过分迷信皇权	(403)
一些具体策略的失误	(404)
第三节 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	(406)
一、两国维新运动之异同	(406)
变法的背景与纲领相同	(406)
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相同，联系的社会力量不同	(407)
变法的路线与结局不同	(409)
二、产生上述异同的历史根源	(411)
经济水平接近，经济结构不同	(411)
同处封建社会末期，封建阶级分化的程度不同	(418)
同历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同 ...	(423)
文化历史传统相近，文化背景与统治阶级的文 化政策不同	(425)
参考书目举要	(441)
后记	(451)

第一讲 建国以来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状况简介

发生在 19 世纪末叶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它既是一次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次惊世骇俗的政治改革运动，曾经引起深刻的社会震荡。这次运动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维新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政治派别。根据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有人提出戊戌维新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戊戌维新运动的这种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地吸引着史学界的强烈研究兴趣。对于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严格说来，早在上个世纪末这一历史事件结束后就已经开始。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上连载的《戊戌政变记》，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解放前出版的有关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专著，大抵都已把戊戌变法列为专门章节加以叙述。但是，在早期的研究者中间，或是康、梁的门生故旧，或是清王朝的遗老遗少，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大多囿于个人恩怨，就事论事。有些著作把戊戌变法发生和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个别历史人物的“性格”、“心理”、“感情”的作用，也有的著作把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简单的宫廷内部和帝后之间的权力之争。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即把光绪皇帝“体弱多病”、“富于伤感”、“机

警严毅不足”等性格特点当作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而视康有为为变法新政中“一局外之人”^①。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虽也提到“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②，但阐述变法的过程仍基本以帝后权力之争为主要线索。认为“慈禧自信力强”，“深思远虑，计划周到”，“光绪殆非慈禧之敌”，“光绪之危险，改革之失败，已定于此”^③。其他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罗元鲲的《中国近百年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莫不如是。只有少数著作能初步看到铸成戊戌变法这一历史现象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实质，如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就认为戊戌变法产生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国内幼稚的资本主义的勃兴，渐次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反映到社会政治方面来”，认为“康有为是带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意识与要求的”，“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这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流产，这种流产乃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阶级诸情况必然地决定的”^④，但在论述变法的过程时，仍然不脱帝党与后党权力之争的框框。总之，尽管这些著作记录和叙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若干历史现象，却远未能找到一把足以打开这个课题科学之门的钥匙。

对戊戌维新运动史进行科学的研究，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的。解放前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这方面可以说起了披荆斩棘、开山引路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解放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是极少数。新中国的建立为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97年，48年来，出版的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下），国立编译馆1947年版，第649—651页。

②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光明印书局1937年版（下同），第485页。

③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54—457页。

④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印书局1937年版，第215—222页。

论述戊戌维新运动的专著、人物传记（限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光绪皇帝五个人物）等近百部，其中港、台及外国著作 14 部；重要史料近 20 种，已发表的专题论文共计千余篇。

下面就建国以来关于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状况作简要介绍。

一、各阶段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

大体说来，建国以来，关于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建国初期至 60 年代中期

这个时期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破了以前把戊戌变法单纯看作宫廷权力斗争的藩篱，而把它当作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来研究。研究的眼界开阔了，不仅孤立地研究晚清的中国政治史，而且开始探讨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并注意到将研究的领域扩大到思想史、文化史等范畴，还把戊戌变法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及其他国家变法的历史对照起来，作比较研究。

这个阶段出版的重要成果，有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戊戌变法简史》（中华书局 1960 年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1961 年版）；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 1964 年版）；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王棣的《维新运动》（南

京大学教材科 1964 年版)；《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等。此外，还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吴玉章等：《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58 年版)；侯外庐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也有显著成绩。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和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主编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8 年版)，是两部重要史料汇编，为研究者提供了系统的原始资料。尤其是《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的出版，弥补了过去以当事人的追忆和私家著述为主进行研究的不足，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个阶段里开过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便是 1958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肯定了戊戌变法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次运动“鼓舞了广大的进步青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它“要求改革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①，“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②。会议肯定了这次变法既是一次“救亡的维新运动”^③，又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④，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⑤。讨论会对戊戌变法的评价充满了历史感，正如吴玉章指出的那样：

① 吴玉章：《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58 年版（下同），第 2 页。

② 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6 页。

③ 邵循正：《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意义》，《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42 页。

④ 戴逸：《戊戌时代的思想解放》，《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19 页。

⑤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11 页。

“凡是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论事情的成败利钝,也不论参加这一事变的人后日的是非功罪,只要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进步作用,我们就要纪念它。”^① 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可谓建国后戊戌变法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还是一分为二的,既肯定它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的进步作用,又指出了它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运动的局限性。然而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当时已出现对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评价偏低、对农民运动的评价偏高的“左”的倾向。

(二) 第二阶段——十年动乱时期

这个时期极“左”路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整个学术思想界处于万马齐喑的病态沉寂之中。当时除了“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等的几篇文章和《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写的《戊戌变法》小册子之外,几乎没有发表什么东西。戚本禹在其《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中,对戊戌变法运动根本否定,认为这次变法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是“崇帝、亲帝、恐帝”的卖国主义者;变法运动,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企图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的活动。就这样,把戊戌维新运动一棍子打到反动营垒中去。毫无疑问,这种极“左”理论禁锢了学术自由,使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处于萧条冷落的停滞状态。一些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文章,提到康有为、梁启超,虽不得不勉强承认他们领导的变法活动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①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周年》,《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页。

但更大量的是把他们说成反对民主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特别是在十年动乱后期的所谓“评法批儒”的高潮中，大搞影射史学，把康、梁均斥为“尊孔复古派”、“儒家代表”人物而大张挞伐。1983年笔者到广州参加戊戌变法的学术会议时，曾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家乡南海县、新会县去作过参观调查，据有关部门保存的文革时期整理的康、梁的材料，都是把康、梁说成反动人物，甚至连称呼都变了，称孔夫子为“孔老二”，恰好康有为在康氏家族中排行第三，即称康有为为“康老三”，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尊孔复辟”的反动派等等，红卫兵将康的墓碑也扒了。康、梁的亲属也惨遭迫害，梁启超的亲属有三口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①。可想而知，在这种气氛下，学术研究根本无法正常开展。

（三）第三阶段——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1988年11月

“四人帮”覆灭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学术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各个学术领域开始了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得到了贯彻落实，使历史学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也显得十分活跃，研究成果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77年至1984年先后出版了邝柏林：《康有为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孟祥才的《梁启超

① 关于康、梁家属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系根据以下三种材料：①中共南海县委办公室1974年整理的文字材料——《关于康有为在苏村、象台情况调查材料》。②梁启超后人梁从械于1983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戊戌维新8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申松欣对笔者的口述。申多年以来协助赵丰田先生编纂《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书，由于工作关系，她对康、梁家属及后人的情况非常熟悉。

传》(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邓潭洲的《谭嗣同传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徐义君的《谭嗣同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段本洛的《谭嗣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 1984 年版);胡绳武主编的《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等著作。另外还有几部资料集出版,如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也在原来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981 年以后,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杰士上书汇录》等一批新的史料,根据这批史料和大量的清宫档案,发现过去研究戊戌维新运动史和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一部史料《戊戌奏稿》(康有为弟子麦仲华编,1911 年 6 月在日本发行)与档案中所载康有为戊戌年的奏折原文不同。为此孔祥吉于 1982 年在《晋阳学刊》发表了《康有为〈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对《戊戌奏稿》进行了辨伪、考证,证明《戊戌奏稿》中收录的康有为戊戌奏议大部分是后来经过改纂的,不能代表戊戌时期康有为政治思想的真实面貌。这是对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围绕此问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论文如雨后天春笋般喷薄而出。1983 年,为纪念戊戌变法 85 周年,在广州举行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 85 周年和康、梁思想研究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学者有百余名,会上论文百余篇。会议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各个方面及康、梁思想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批判极“左”思潮,对戊戌维新运动及其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戊

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仅 1983 年一年发表的论文近 150 篇，几乎相当于“文革”前论文的总和。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在此基础上，从 1985 年以后，又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主要有：孔祥吉：《康有为戊戌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王棣：《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王汝丰：《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范士华：《戊戌维新：中国的一次改革》（求实出版社 1987 年版）；吴廷嘉：《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吴熙钊、黄明同：《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马洪林：《康有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钟贤培主编：《康有为思想研究》（广东高教出版社 1988 年版）；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出版社 1987 年版）；孙孝恩：《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等等。另外，还有一批资料集出版，如王棣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由姜义华、吴根樑编校的《康有为全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前三卷。这个时期发表的论文也最多，仅 1985—1988 年底，各种形式的学术论文、书评、史实考证等文章 400 余篇，等于 1949—1984 年 35 年的总和。1985 年 5 月由《历史研究》编辑部 and 人民出版社中国史编辑室邀请部分史学工作者座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并就如何继续深入开展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发表意见。会后整理成《深入开展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一文在《历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